



编者按: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和党史学习教育,校(院)机关党委组织开展了“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今选登三篇优秀征文,以飨读者。

党引领我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教授

○ 朱林兴

“吃水不忘掘井人。”我出身于世代农家,一个当年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和教授,这是党对我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我三岁丧父,生活艰难。别的孩子六七岁开始上学,而我却在割草放牛,九岁还没上学,直至梅陇小学党支部书记汤英老师亲自上门做我母亲的工作,我才开始走上了求学之路。1960年7月我于上海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虑到家庭经济拮据,期望早点工作,就报考了上海县师范学校。1962年即我读师范最后一年时,国家因经济困难将师范改为普中。我也出于经济困难原因而主动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两周后,班主任、共产党员褚祖煜老师不顾体弱有病,从学校步行十多里路来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返校上学。

要不是当年遇上汤老师、褚老师等贵人,或许我的人生履历要重写。汤老师和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让我对党组织无比向往。1963年我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后,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决心要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争取进步。1973年5月,我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党赋予我政治生命。

1981年我由企业调入上海财大,1988年后到市工业党校工作,2009年6月退休。在近三十年教学生涯中,我主要从事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教学研究。1982年9月,我参加了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上海财大联合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交通运输项目培训班”,该班旨在借鉴国际经验,解决我国交通瓶颈的问题。培训班结束后,根据领导安排,我和交通局尚汉信先生领衔撰写《交通运输项目经济评估》,此书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3年初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从战略高度要求上海财大组织力量

研究、编写城市经济学教材,为大学本科和市级经济管理干部讲授城市经济理论。我被任命为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当时,城市经济学在世界上还是一门新学科,我国各地尽管也开始重视对其的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理论、范畴、边界、起始点以及其他学科关系等,基本上不清晰。而领导的要求是,两年内须出书和开课。面对要求高、压力大的困难,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全室同事和老专家的努力,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终于顺利完成。1986年6月,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一书由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属国内较早的城市经济学专著,汪道涵市长题写书名,倪天增副市长作序。1992年该书获全国城市经济学专著奖。当我稍有进步和成绩时,党组织给予充分肯定。1986年我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87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五年后晋升为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国内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但也出现了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违规“圈地”、违反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等现象。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经济学者的责任,我深感经济须发展而如此征地不可取。我先后就规范征地制度、保护社会中农民利益和保护耕地等问题出版了多本专著,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8篇文章为多家权威文摘刊物转载,有6篇被编发内参上报,其中《维护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被选入《观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100名专家的前沿观点》一书。2002年4月我写了《农民集体土地要依法流转》,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收到了多封来自上海郊区和外省的农民来信,反映中央土地流转政策被扭曲致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我通过对本市郊区x镇x村的调查,写成文

章,由文汇报编发内参上报,迅即得到了当时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的批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编发内参上报中央。市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了农地非法流转的现象,使失地农民权益得到了合理补偿或维护。

讲真话,维护农民利益,难免会触犯某些人利益而遭到一些伤害。有一次,我根据一封农民来信去一个地方调查闲置地问题。当地一些人企图对我干扰,以至动粗。好在有人知道我当时还兼任市府决策咨询专家,有个“护身符”,投鼠忌器,这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

有朋友曾调侃我:“讲真是经济学教授、房地产专家,却没见过你炒过一套房,真是大白鹅一只!”我一笑了之。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在报刊发文强调城市住房的功能是居住(这个观点我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之一),抨击房价虚高和炒房风,批评一些房地产学者不该在为房地产热煽风点火中发炒房财。

我已退休多年,但我依然坚持学习,关心时事,以年老微薄之力,用笔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这两年,我写了散文、随笔、论文近百篇,不少文章受到了社会好评与关注。如长期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国人尊美国父亲节为中国父亲节,产生了极不好影响。我就这个问题利用微信平台发表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响应,点击近十万,此文后刊发于《新民周刊》。可喜的是今年出版的日历、台历都有了明显变化。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以前多笼统地写父亲节,而今年注明是美国父亲节。

回顾以往,党对我倾注无限深情厚意,我一直铭刻在心。情知老去无多日。我依然坚持初心信仰,历久弥坚,永不动摇。

(作者系退休教师)

形势下老干部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目前,市委党校共有离退休人员833人,其中离休干部30人,退休干部582人,退休工人221人。其中90岁以上的老同志有57人,80-90岁的老同志有139人,组织关系在校的党员共计493名,分属于2个离退休党支部和14个退休党支部。离退休人员数量庞大,并逐年递增。离休干部平均年龄已达91岁,整体步入“后双高期”(高龄和高发病期),需要特别的关心和照顾。退休老同志人数逐年增加,结构层次不一,需求多种多样。所以老干部工作各种事务琐碎繁杂,有些事情来回反复多次,需要特别的耐心和细致。并且老干部工作中突发事件多,不分上下班、节假日、白天黑夜,只要老同志有需要,我们要随时出现,随叫随到。

10年来,我一直工作在平凡的老干部工作岗位上。10年来,我去

何为“老三篇”

“老三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三篇短文合称。最早一篇是发表于1939年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发表于1944年,最后一篇《愚公移山》发表于1945年。

当年,“老三篇”一经发表就备受欢迎。从当时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地学校中,这三篇文章都被列为必读教材。后来,为了表述更加简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在课程和教材目录中不再一一列出篇名,而直接称其“老三篇”。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这三篇文章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全国掀起了学习“老三篇”的热潮,当年12月就重印了13次,不久后正式出版“老三篇”的英文版,还有了少数民族文字的“老三篇”版本。自此以后,“老三篇”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老三篇”讲了三个“凡人非凡”的故事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讲述了一个普通战士为民牺牲的英雄之举。张思德出身贫寒,18岁就参加革命,22岁加入共产党,曾经在战斗中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多次负伤。长征到达延安后,1944年9月5日,他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牺牲时是中央警卫团战士,年仅29岁。毛泽东一生中树立过两个影响深远的普通战士典范,战争年代是张思德,另一个就是建设年代的雷锋。两个普通战士,都是把短暂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榜样,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形象代表。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为《纪念白求恩》一书所写的序言,传扬了一个外国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人格风范。白求恩是国际著名胸外科专家,加拿大共产党员。1938年3月底,他来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卫生顾问。他在为伤员施行手术时被感染,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把自己高明的医术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在平凡的医疗工作中,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闭幕词。毛泽东用“挖山”象征革命,用“挖山不止”象征共产党人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精神品

格,用“感动上帝”象征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源泉所在,展现了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完成“移山伟业”的必胜信心和永不松懈的精神状态。毛泽东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加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精神品格。

“老三篇”由三篇短文组成,形成时间不同,着眼点上各有侧重,但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立足千万党员的精神风貌,以小见大,从平凡见不凡,由具体见抽象,用“四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凡”的精神力量,进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谁而生”“如何活着”“为何这样活着”等重大问题。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人生在世,总要思考生命的意义,确认生活的价值。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生死观要凸显“死的意义”,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用“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对比,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而生、为谁而死”这一人生大问题,颂扬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名利观。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是共产党人名利观的核心。“老三篇”赞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号召全党“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白求恩、张思德等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们都是模范地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脱离了低级的物欲层次,摆脱了私欲,进入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关心党和群众远超过关心个人,关心他人远超过关心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的是非观。是非观是对“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的回答,这是一种价值导向。“老三篇”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人民利益”这一价值标准。我们干事创业,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体现在共产党人“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为人民谋幸福”的实际行为上。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既要改正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还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如此,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上兴旺起来。

“极端负责、精益求精”的事业观。如何对待本职工作?毛泽东为全党树立起白求恩这一典范。“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在白求恩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这一精神品格。

(作者系哲学教研部党支部书记、教授)

『老三篇』不『老』的精神魅力

○ 张春美

“老三篇”不“老”的思想魅力

“老三篇”由三篇短文组成,形成时间不同,着眼点上各有侧重,但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立足千万党员的精神风貌,以小见大,从平凡见不凡,由具体见抽象,用“四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凡”的精神力量,进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谁而生”“如何活着”“为何这样活着”等重大问题。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人生在世,总要思考生命的意义,确认生活的价值。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生死观要凸显“死的意义”,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用“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对比,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而生、为谁而死”这一人生大问题,颂扬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名利观。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是共产党人名利观的核心。“老三篇”赞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号召全党“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白求恩、张思德等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们都是模范地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脱离了低级的物欲层次,摆脱了私欲,进入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关心党和群众远超过关心个人,关心他人远超过关心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的是非观。是非观是对“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的回答,这是一种价值导向。“老三篇”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人民利益”这一价值标准。我们干事创业,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体现在共产党人“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为人民谋幸福”的实际行为上。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既要改正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还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如此,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上兴旺起来。

“极端负责、精益求精”的事业观。如何对待本职工作?毛泽东为全党树立起白求恩这一典范。“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在白求恩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这一精神品格。

(作者系哲学教研部党支部书记、教授)

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

○ 王雷

时光荏苒,一转眼我在老干部工作岗位上已经快10年了。2011年,我从上海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就开始从事老干部工作。2015年,我考上市委党校公务员,继续从事老干部工作。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老干部办公室(简称老干办)的,包括平时对人介绍我也常说自己是老干办的,因为我的具体工作职责就是做好离退休人员的服务与管理,按照我们的行话说,我是一名老干部工作者。

有人说,老干部工作不适合年轻人,老干部工作是给快要退休的老同志做的。也有人说,老干部工

作是清闲的、适合养老的工作。其实,并非如此。老干部工作虽然不是中心工作,但它既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服务性工作,又是一项服务性很强的政治性工作。它传递着党和政府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关心老同志,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他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老干部工作承载着党中央关心爱护老干部的重要任务,是一项需要付出、需要奉献的重要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老同志的尊重和关心,也为做好新